

■万建中/著

# 两种理财观念的碰撞 与农民心态的宣泄

——识宝取宝型故事中禁忌母题释义



【作者简介】 万建中,1961年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民俗学博士。北京,邮编:100875。

【摘要】 识宝取宝型故事往往以失去宝物结尾,而失去宝物大多是宝物持有者违背了某一禁忌的缘故。把这一母题提出来进行专门研究,便可发现违背禁忌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动因。

【关键词】 识宝取宝型故事;禁忌母题;农民心态

【分类号】 I20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387(2000)02-0055-05

**识** 宝取宝型故事是中国一个比较大的故事种类,异文极多。明代徐应秋在他的《玉芝堂谈荟》中就曾专设“异宝难识”条,内中汇集了数则有关魔物的传说故事,其中有出于唐人笔记的《魏生》(《祥异记》)、《青泥珠》(《广异记》)、《宝骨》(《酉阳杂俎续集》)、《水珠》(《纪闻》)、《龟宝》(《金华子》)等故事,也有出于唐以后古籍中的《协金石》、《龙蕊簪》、《海井》等故事。将此型故事划归于一类集结起来,这在中国尚属首次。中国老一辈民间文艺学家对此型故事曾予以密切关注,1936年钟敬文先生在《古传杂钞》<sup>①</sup>一文中,就明确指出“胡人识宝故事”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他说:“胡人识宝型故事,在古代交通史、民族心理学等研究上,是一种颇值得重视的资料。中国的这个‘故事群’,虽然曾经日本中国学研究者一再地加以论述(关于这,我在《妇女与儿童》某期上曾略述及),但待搜集的资料和待阐发的意义尚颇丰富。”沿着钟先生的思路,我们发现禁忌母题在此型故事中亦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将其抽提出来加以细致地剖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阐发“待阐发的意义。”

我们先浏览一下一则识宝故事完整的文献文本:近世有士人耕地得剑,磨洗诣市。有胡人求买,初还一千,累上至百贯,士人不可。胡随至其家,爱玩不舍,遂至百万,已克明日持直取剑。会夜佳月,士与其妻持剑共视,笑云:“此亦何堪至是贵价?”庭中有捣帛石,以剑指之,石即中断。及明,胡载钱至,取剑视之,叹云:“剑光已尽,何得如此?”不复买。士人诘之,胡曰:“此是破山剑,惟可一用。吾欲持之以破宝山。今光芒顿尽,疑有所

触。”士人夫妻悔恨,向胡说其事,胡以十千买之而去。<sup>②</sup>

此剑乃非常之物,不得随意使用。士人不知就里,导致宝剑失灵,到手的大批财富顷刻化为乌有。这里显然叙述了一个禁忌母题:设禁的环节被合理地省略掉了,目的是让宝剑持有者主动违禁。士人探究宝剑何以值百万的心理,人皆有之,故而违禁不可避免。又前有“胡人来买,初还一千,累上至百贯,士人不可”的交代,禁忌母题的意义便提升至道德品质的层次:贪心不足是遭受惩罚的真正原因,进而宣告不劳而获生活梦幻的破灭。

通过“掘藏”而获意外之财,是中国民间古已有之的普遍心态。《搜神记》卷十八《张奋宅》略谓“巨富张,衰老财散,卖宅与程应。应入居,举家病疾。转卖何文。文先独持大刀,暮入北堂中梁上,至三更竟,有黄衣、青衣、白衣者出现。问之,分别为金、钱、银也,各藏地下,及晓,文按次掘之,得金银五百斤,钱千万贯。由此大富,宅遂清宁。”富人宅邸,或有遗资,自属情理之中,而何文不惧凶宅,独得掘藏。举手之劳,而致巨富,遂使后世中国人常生此梦想。其绵延不断,渐成民间意识,足称奇观。

宋代苏轼《仇池笔记》卷下《盘游饭谷董羹》云:“江南人好作盘游饭,鲑脯脍炙无不有,埋在饭中,里(裡)谚曰‘掘得窖子’。”此种饮食,正表明了大众的期待。佚名《嘉莲燕语》又载:“吴俗迁居,预作饭米,下置猪脏共煮之。及进宅,使婢以箸掘之,名曰掘藏,阖门上下俱与酒饭及脏,谓之散藏,欢会竟日。后人复命婢临掘向灶祝曰:‘自人是宅,大小维康;掘藏致富,福禄无疆。’掘藏先祭灶神然后食。”<sup>③</sup>掘藏进

入了信仰的领域。近代以来,掘藏心理犹未减弱。史襄哉《中华谚海》等谚语集中都有“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来当和尚”民谚,把掘藏当作人生中一个阶段的典型心态,且与“游荡”、“和尚”相对应,足见掘藏乃不劳而获的精神实质。

2 掘藏致富,原属梦想,与正统的道德观格格不入。然而,其又是如此具有诱惑力,甚至成为有些人生活的希望。于是,利用这一题材进行道德说教,便可充分地迎合民众久已积淀下来的接受心理。将宝物神秘化是编织故事的关键一步。清康乾时龚炜《巢林笔谈》曾说:“财,犹泉也,流则其性,违性不祥,故有埋积日久为怪为祟者。”“为怪为祟”即为禁忌,如何才能做到避免“违性不祥”,即恪守禁忌,故事全然摒弃了技艺甚至是理性的因素,而将发财与否的结局一股脑儿地托付给了宝物拥有者的道德品质状况。也就是说,整个识宝故事的重心集中于拷问道德,掘藏不仅是对人的品德的奖赏,更是对人的品德的考验。面对身布禁忌的宝物,掘藏者们没有任何“禁忌”的心理预兆,左右他们下一步言行的惟有个人的品性。一旦违禁,意外之财顿失。禁忌母题渗出的令人发笑的“悲剧”情调(掘藏者往往悔恨莫及),散发着令人醒省的批判意义。前引《破山剑》的禁忌母题,就对士人贪婪、狡诈、不讲信义等恶德作了尖锐的讽刺,劝人勿贪、安守本份的用意十分明显。

明·周暉《金陵琐事》卷三中记有一则名为《蜘蛛日晷》的同类故事:索姓回回避雨人家,见佛几净水碗中一石,遂问卖否,主人漫答之曰:“有价即卖。”回回次日携银,往来两三遍,辄添其价。主人谓石久尘埋,回回尚与高价,因磨洗一新。数日回回又至。见石磨过,大惊长叹曰:“如何毁却至宝,此石列十二孔,按十二时辰,每到一时,有红色蜘蛛结网其上,蜘蛛,乃一片死石矣。”不顾而去。

如果说《破山剑》故事中士人的违禁还多少带有好奇成分的话,那么,此故事中主人的违禁,则完全出于贪心不足、追金逐利的心理。禁忌母题的道德劝惩意图更为突出。

有意思的是,这两则古老的识宝故事在一衣带水的日本竟然合而为一,成为一篇名为《长崎的鱼石》的故事异文,其情节更为详细、复杂,梗概如下:

长崎伊势屋地方有一位叫久左卫门的人,他和一个唐人颇有交情。这个唐人常常盯着他家仓库石壁里的一块青石看,并要求他将石头转让给自己。久左卫门答应以后修房子时,将这块青石替换下来,就把它赠送给唐人。唐人说:只怕以后这愿望未必能实现。我愿出一百两金子,务必请现在就把石头给我。久左卫门一听这话,心生狐疑,想法就不同

了,反而更不愿匆匆忙忙将石头卖去,就干脆回绝了唐人。唐人还是求购,一直把价钱提高到三百两,但终于未能遂愿。唐人西归以后,久左卫门把这块石头取出来,请了磨玉工人来鉴定。

工人把石头打磨了,看不出它有何出奇之处。接着他们剖开石头来看,看到里面有水,还有两条红色小鱼跑了出来,可是马上就死掉了。久左卫门觉得很可惜。次年唐人再次东渡,来找久左卫门,听他讲了经过,不禁流泪长叹。唐人说,这石头是个大宝贝,名叫“鱼石”,细细地打磨这石头,达到含水的地方,使它薄得能够透过水而看到水中的鱼。任何人看到这一双鱼在水中的游泳的姿势,他的心便会自然而然地平静松弛下来,从而收到延年益寿的效果。因为唐朝的贵人不惜重金求取此石,所以这次本想用三千两金子来买它的。唐人说完,把准备好的金子拿出来给久左卫门看。两个人都非常失望。<sup>④</sup>

石田干之助认为这个故事是唐代同类故事的一个变形,与前引《破山剑》故事有颇多相同之点。其实,从禁忌母题的角度看,其与《蜘蛛日晷》故事更为相近:禁忌的对象皆为宝石,违禁的方式都是洗磨宝石,且违禁使得宝石中的动物(一为蜘蛛、一为“石鱼”)受到破坏。故事称商贾为唐人,实乃东洋人对汉商贾之统称。

3 识宝故事中所掘皆为宝物,而非金钱,故有一个识宝的过程,这是禁忌母题生发的一个前提。故事名为“胡人识宝”,从禁忌母题的角度审析,胡人(清人王士禛在《香姐笔记》卷七中也记了《蜘蛛日晷》的故事,但识宝者不称“索姓回回”,而记道“江宁有西域贾胡”)也是一个隐藏的传报禁忌信息的角色,他的每一次抬价,都是在牵引着宝物拥有者一步步迈入禁忌的陷阱。而真正决定故事情节发展走向的是宝物的拥有者。他们违禁还是守禁,不仅直接导致故事完全不同的结局,而且折射出其道德水准的高尚与低下。

宝物的形态不一,倘若为坚韧的固体,所藏便多在地下,有些宝物极易腐烂,便省却了“藏”和“掘”的环节。《力巴卖画儿》<sup>⑤</sup>故事是这样的:

力巴(关东方言,外行的意思)上山砍柴,背一扛柴火下山,忽然想到斧子落在山坡上,就在一楞神的当儿,被一个画画的画下来了,并且送给了他这幅画,告诉他,实在没钱花的时候,上街把画卖了,得多要钱。力巴认为一张纸还没一担柴沉,能值几个钱,遂不以为然。看看穷得实在过不下去,便去上街卖画,狠了狠心,要个祖宗价钱五吊钱,一天没人过问。傍晚来了一位买主,上赶给五万吊,答应明日带钱到力巴家取画。力巴到家反复端详着画,突然动了心眼,这画上的砍柴人手里没有斧子,咋砍柴,万一让

买画人看出来,还能要这幅画吗,于是连夜给画上的砍柴人手里加把斧子。谁知这一画,才是狗尾续貂,画蛇添足,当买画人看到被力巴修改后的画时,不能不长叹一声:“添上这把斧子,一吊钱也不值了。”

许多识宝故事都有一段买卖交易被暂时搁置的时间。商人总是因携带的钱物不足而没有及时把宝物带走。而宝物的拥有者一旦知晓所持之物非同一般,贪婪、好奇加上无知,共同促使他们做出了违禁的举动,与丰厚的财富失之交臂。如果交易立即成功,违禁者与禁忌的对象(识宝之前,宝物并不处于禁忌状态)便发生分离,违禁即无从进行。

识宝故事表面讲述了一个宝物交易的过程,实际进行的是一场农民与商贾意蕴深刻的对话。上面故事中,宝物的获取都是无意之中的,亦即并非肇端于贪财的欲望。这种欲望的萌生乃至膨胀,是在宝物持有者获知所取为宝物之后。他们的违禁,除了受自身贪欲的催使之外,还出自一种中国农民共有的集体无意识,即他们心理一直涌动着拒绝掘宝的动机,而藏宝反倒是他们一种根深蒂固的生活态度。“中国农民习惯的思维方式是:渴望致富,但认为最可靠的财源是万物生长的土地;倘若手中真聚敛起了一些财物,便喜欢将它们藏于地下。他们认为只有地下才是最可靠的保险箱。财富在他们手中就这样一代代保存着,作为传家宝。”<sup>⑥</sup>根植于土地的藏宝意识与立足求富本性之上的掘藏欲望,共同构筑成中国农民文化性格的两面,它们将农民历史及现实的价值判断推向两难的境地。在一个具体的“识宝”事件中,这“两面”便互动为一个禁忌母题。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中有一个故事,称一仆人将主人临行前托付的银子埋藏地下,待主人归来时如数交还,却遭到主人的斥责。另两个仆人分别用主人的银子经营获利,则受到主人的奖赏。埋银在这里被看作是“又恶又懒”的。识宝故事中商贾的用财之道与此如出一辙。正如程蔷女士所说“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发掘财宝,使之参与流通,以便创造更多更大的财富。这就是商人所投身的事业。这事业恰恰与农业中国的传统观念相反,不是将财富深埋下去,而是要让已有的财富变得更多。”<sup>⑦</sup>商人的这种发财愿望在这场交易中,实际遭遇农民发财愿望的抵制。宝物持有者的违禁行为,尽管出自无意,却“曲折含蓄地说明,从传统的农耕文化心理来看,脱离勤勤恳恳的耕种和制作,即使你已获得发财致富的某种可能性,最终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违禁,可以说是农民以自己不自觉的行动对那些不安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辛劳农耕生活者的委婉劝诫,同时,也是对总是企盼着“一本万利”的商人的间接否

定。<sup>⑧</sup>古代中国人宁愿选择埋藏这种保守而稳妥的积财方式,而另一些人则反复做着同一个掘藏致富的梦,尽管这个梦被装点上了道德和神秘的光环,它的本质还是不劳而获的侥幸心理。耐人寻味的是,由于有了禁忌母题对这个铜锈斑驳的梦的击碎,故事不仅没有因此梦而黯然失色,反而由此洞穿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故事通过一个禁忌母题获得了一个透视民族心理的简洁而生动的范式。

4 从故事情节发展逻辑的顺序而言,“取宝”应在“识宝”之前。然而这两个连贯的环节一般不会出现同一则带有禁忌母题的故事里。因为既知所取为“宝”,就无识宝之必要;反过来,在不知所掘之物有无价值的情况下,详述获取的经过就显得多余。取宝故事中构成禁忌的因素较之识宝故事更为复杂。取宝时应恪守什么样的禁忌,是由宝物本身的特性决定的。故事中的宝物千奇百怪,伴随它们的禁忌自然也是千姿百态的。纵观取宝故事的禁忌母题,大致可归为两类:一是正在增殖或变化财、物时的禁忌;一是其他使用宝物过程中的禁忌。后者的情况较为多样,时间、地点、距离等等诸多因素都有可能成为禁忌的“陷阱”。

《聊斋志异·钱十巫》叙夏商,贫甚,有巫者称其50岁当有巨金自来,迨57岁,偶茸墙垣,掘得1325两。窃议巫术小舛。邻人知其掘藏,潜告邑宰。宰最贪,拘商索金,商尽献之。居无何,宰迁南昌同知,逾岁,商以懋迁南昌,同宰已死。妻子将归,货其粗重,有桐油若干篓,为商购之,其中恰是当年掘镪之数。可见,掘藏取宝早了一年,藏银并不能归己。此属时间禁忌。“时间”的表现形式并非单一,这就为时间禁忌的展示提供了多种渠道。《“红山”的故事》<sup>⑨</sup>讲,在石洞里取财宝的时候,必须在数一百个数以前跑出山洞,然后把开石洞的钥匙送回小松树底下。贪不够因舍不得走被关在里面。一则关于八宝山的传说是这样的:京西八宝山,藏八件宝,山下老夫妇院里种一架瓜,来一位南方先生买瓜,付款后,约定瓜熟时必来。入冬,老夫妇怕瓜冻,提前摘下(按,犯了“不足日”的禁忌)。南方先生拿瓜开石门,金牛、金马、金鸡、金磨、金豆子等,呈于眼前,正待伸手取拿,石门闭,宝仍存于内,因称八宝山。<sup>⑩</sup>《狐偃山的传说》<sup>⑪</sup>中的禁忌母题则与地点有关。南蛮子偷取狐偃山里的金马驹,是得到了仙女的指点,仙女送给他一粒黄瓜种子(宝物),必须种到二亩良田里,田里不能再种别的东西,每天锄三次,最后因当地老农夫犯禁而前功尽弃。距离禁忌指的是要与宝物保持一定距离,不能触动它。《凤凰蛋》<sup>⑫</sup>讲皇上的三公主得了一种怪病,要用一个凤凰蛋做药引子。韦水牛在神鸟的指点下得到一个凤凰下的蛋(宝物),并得到

告诫:编一个小篮,用竹梢编一个耙子,用耙子取蛋放进小竹篮里,千万别用手去碰蛋。后因反角韦老五抓住了蛋而招致灾祸。另外,使用宝物的过程中还有其他方面的距离规定,如《骡子寨的传说》<sup>⑩</sup>讲,南蛮子取宝时,用黄瓜打开了山门,让当地一小伙子在山口处拿一根灵芝草一直往外走,百步之内不许回头。当地小伙子由于好奇,走到九十九步时忍不住回头看,金牛被吓跑,山门合住了。

前一类禁忌母题的表述则颇为单纯,限制“数量”成为惟一的禁忌要求。《大冬瓜》<sup>⑪</sup>的故事情节较曲折,梗概简缩之后是这样的:1. 坏心的哥哥分家时耍了两亩长杖地,余下半分,弟弟只分了半亩;2. 弟弟地里结下的一个大冬瓜被豺狼虎豹抬到一座庙里煮熟了;3. 想要就着饽饽吃,一只猴子敲着小铜锣(宝物)说了“饽饽快来!”地上便堆了一大堆饽饽;4. 老虎警告说铜锣不能被敲碎;5. 弟弟打跑了动物,得到了铜锣;6. 哥哥知道后,设法骗取了宝物,要金子的时候,他拼命地敲,越敲金子越多,后来终于敲破了;7. 哥哥的屋变成一座大山,他和宝器都不见了。

有的故事讲财物是直接从小洞流出来的。大意是:在一座深山,有僧人修行。有一年闹旱灾,僧人没粮食,后来发现有一个山洞(宝物)流出来米,每天流出的量不多,但够他们一天吃的。有个小和尚嫌每天流出的米太少,就把洞口凿大些,但从此就不再再有米流出来了。<sup>⑫</sup>云南武定狮子山一带流传一则名为《石乳滴米眠龙洞》的传说,<sup>⑬</sup>有着同样的禁忌母题:明建文帝落难期间,带着程济辗转来到了浪穷(今洱源)牛街的观音山,山上有一个石洞,洞里有现成的石床、石桌、石凳,刚好能容两人居住。于是,二人便决定在石洞里暂避一时,他们住下后正愁无米无水做饭充饥(L),建文帝抬头见洞中有两个像乳房一样的石钟乳悬在头顶上,就跟程济开玩笑说:“空有两只大乳,却无乳汁哺人。”话音刚落,只见一只石乳一粒一粒地落下米来,另一只石乳一滴一滴地往下滴水(LL)。他们二人赶紧设法接米接水,整整接了一天一夜,才能够一个人吃。此后,建文帝就常靠这点米、这些水度日,而程济就常外出化缘。现在,洞内的石桌石凳和两只石乳还在,只是后来有人嫌出米太慢,把出米孔凿大,结果倒反而一粒米也出不来了。

此故事中,“禁令是含蓄而非外露的”(阿兰·邓迪斯语)。我之所以标出了缺乏(L)和缺乏结束(LL)两个符号,是因为它在结构方面可以被视为此型故事的典型代表,与“天鹅处女型”故事基本形态的结构模式是相同的,完全符合阿兰·邓迪斯所谓的“一个常见的六综合体”。故事结尾回归为初始的缺

乏。“通常,缺乏是一些不明智行为的结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违反了某一禁令的结果。”“在结构分析基础上,人们可以说,在以初始缺乏开头的任何故事里,从理论上说,这个故事是以违反了引起缺乏的禁忌而开始的。”<sup>⑭</sup>这就是说,识宝取宝和天鹅处女两型故事中的禁忌母题加上缺乏(L)及缺乏的结束(LL)两个情节单元,构筑了一个交替反复的结构模式,即故事可以不间断地讲下去。其结构本质与“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在讲故事,讲的是什么呢,从前有座山……”是完全一样的。此禁忌母题结构模式的这一交替反复的叙事特征,使之在流变过程中可以生衍出许许多多的亚型。

5 “不明智的行为”或者说违禁,导源于不满足于现状的思想意识,而结尾重又回到“初始的缺乏”,则是对贪心不足的抨击和对知足者常乐的宣扬。这是受到中国农耕文化支撑的一种顽固的农民心态。故而此禁忌母题一直流传至今,吉林省的部分地区传讲着一则名为《吸金石》的故事,说一店主见门前河水一涨一落,现出一个石柱,石柱上有酒盅大的一只石碗,里里盛满了黄澄澄的金沙。取来金沙后,犹嫌金沙每盅太少,遂将金盅开凿为金碗,但湖水涨落后,石碗里一粒金沙也没有。原来那小石窝里有一层吸金石,贪心的店主把那层吸金石凿去了,哪还会再有金沙呢?<sup>⑮</sup>

数量禁忌的目的是求得“适量”。任何财富都应是劳动所获,大自然不可能永远无偿地赐予。倘若没有这种禁忌,宝物可以无休止地不加限制地使用,那么财富就会变得无限,财富就不成其财富,这是不现实的,也是现实不允许的;另外,故事也会变得没完没了,这不是故事的,也是故事不允许的。因此,“米洞”等的断流实属必然。然而,故事却借助禁忌母题,将这种必然归咎于人的贪心。倘若没有人的违禁行为,必然或许会是或然。这就把违禁的严重性推及极端。将严密的自然法则撕开了一个裂口,再灌输进沉甸甸的道德教化的铅水,正是此型禁忌母题构思上的精巧之处。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使用宝物极易犯不加节制的错误。而少数人财富的骤增必然会加剧贫富不均。有一则和上面“流米洞”的禁忌母题相似的故事,直截了当地宣扬了均贫富的思想。大意说:有三个女孩经过一个山洞,见到洞口(宝物)有各种各样的珠子流出来,就用随身带着的篮子去装珠子。后来,篮子都装满了,但是珠子还是不断地流出来。于是她们决定把篮子里的珠子带回家,并且在离开时把洞口塞住(违禁),免得别人见也来拿。可是,当她们回来打开洞口时,却什么也没有流出来了。”<sup>⑯</sup>自己好了,也要让别人好,这历来是农民普遍的伦理心态

和“均贫富”的生活准则。直至改革开放以后,才喊出了“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

按通常的想法,宝物的效用大致应有起死回生、预测未来、祛病消灾、早生贵子、招财进宝等等,而在取宝故事中,绝大部分宝物都是能够变化和增殖财物。反角往往是不满足于财物的增殖数量和速度。“过量”使用(违禁)了宝物,导致宝物失灵,本已到手的财物也化为乌有。对知足的歌颂和对贪心的鞭挞,是这一禁忌母题的思想精髓。从这可以看出,“反贪”是民间主要的道德行为之一,这迥然有别于上层社会的道德法则。上层阶级是绝不会将贪心不足视为不可容忍的恶劣行径的。长期囿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生活圈中的乡民,自然会奉知足者常乐为至尚的生活圭臬。

取宝故事中的禁忌母题还郑重告诉我们,设置种种使用宝物的戒条,透露出故事的创作者、传播者内心深处的伦理倾向性:从根本上来说,他们拒绝宝物,甚至恐惧宝物这回事的发生。这种执著于土地、热衷于在田地踩着脚印、希冀过着安泰生活的农民心态,极大地抑制了任何形式的生活巨变,哪怕是让生活急速光耀起来。“他们不希望也不允许有人发大财,不能破坏社会的平衡和安宁,幻想着维持只有在氏族社会中才可能有的境界——使自己的平等感情得到完全满足。”<sup>⑩</sup>传说中导致取宝行为失败的种种禁忌,实质是人们臆造出来的,以维护自然经济、小农状态免遭商业行为和观念冲击的一种“法宝”。<sup>⑪</sup>

取宝故事是私有制的产物。私有制出现后,才产生了据宝已有的观念和囤聚财物的行为。然而,私有制不仅不能消淡传统社会的上上下下都普遍存在着的平均主义的意识,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历仕三朝的齐国名相晏婴提出的“均贫富”的生活哲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力行运作。取宝故事中宝物被套上禁忌的“枷锁”,拒绝人们任意使用,其实就是平均主义心态的形象呈现。即使是在故事中,人们也不愿意有人先富起来。

不仅如此,取宝故事借助禁忌的威力,不仅让违禁者复归于物质缺乏的“原态”,而且迫使有的人身陷财富的深渊,一命呜呼。前引《大冬瓜》故事中临近结尾的一段是这样的:“他(指哥哥)不断地狠敲(违禁),金银埋到了腰。小铜锣被敲碎了,敲碎的地方变成一个大洞,从洞里冒出一股旋风,旋出了大的小的石头,打在他身上,他被金银埋住而逃脱不得。”这一禁忌母题让贪财者入地狱,其深刻的蕴意远远超越了“谴责”的层次。将财富与死亡相提并论,前

为因后为果,着实让人惧怕富贵二字了。“穷易过,富难享,宁受疼,莫受痒。”“一不积财,二不结怨,睡也安然,走也方便”,“富贵是无情之物,看得它重,它害你越大;贫穷是耐久之交,处得它好,它益你反深。故贪商旅而恋金谷者,终被一时之显祸;乐箪瓢而甘敝缊者,永享千载之令名。”<sup>⑫</sup>这些民间盛行的劝诫话语伴着上面的禁忌母题,共同为我们描画出了一一种被吓出来的知足心态。

注释:①刊《艺风》第四卷第一期,1936年1月1日上海嚶嚶书屋出版。后收录《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511页。②戴君孚:《广异记》,据《太平广记》卷二二二引《广异记》。③此书未见传本,文乃据陶宗仪编《说郛》转录。④据日本学者石田千之助云,此故事出于柳田国男编《日本昔话集》上编。转引自程蕃《中国识宝传说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39~241页。⑤杨景:《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吉林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第886页。⑥⑦⑧⑨程蕃:《识宝传说与文化冲突——识宝传说文化涵义的再探索》,《民间文学论坛》,1993年第2期,第5、5、4、4页。⑩《民间文学》,1961年第2期,第92~95页。⑪张紫晨:《中国古代传说》,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9页。⑫《山洼洼的野故事》,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18~121页。⑬芜湖市文化局、芜湖民间文学工作者协会:《蛇精的传说》,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47~51页。⑭《太谷民间故事集成》(内部资料本),太谷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第106页。⑮董均伦、江源:《聊斋佚子》,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71~87页。⑯金荣华:《金门民间故事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1997年,第5~6页。⑰东有春、阎小强:《亦帝亦僧亦为仙,半史半野半相疑》,《东南文化》,1998年第3期,第97页。⑱【美】阿兰·邓迪斯:《北美印第安民间故事的结构形态学》,《世界民俗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296页。⑲顾文显:《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吉林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第743页。⑳金荣华:《台东大南村鲁凯族口传文学选》,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1995年,第46~46页。㉑拉法格:《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1978年,第89页。㉒陆震:《中国传统社会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4页。

参考文献:【1】程蕃:《中国识宝传说研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39~241页。【2】【3】【4】程蕃:《识宝传说与文化冲突——识宝传说文化涵义的再探索》,《民间文学论坛》,1993年第2期,第2~5页。【5】东有春、阎小强:《亦帝亦僧亦为仙,半史半野半相疑》,《东南文化》,1998年第3期,第95~99页。【6】【美】阿兰·邓迪斯:《北美印第安民间故事的结构形态学》,《世界民俗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291~304页。【7】陆震:《中国传说社会心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4页。

收稿日期 1999-12-09

【责任编辑 廖智宏】

【责任校对 蒙本曼】